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八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杨仁敬 詹树魁 蔡春露 甘文平 / 主译



诗歌和文学批评
1940年—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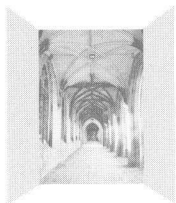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八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杨仁敬 詹树魁 蔡春露 甘文平 / 主译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诗歌和文学批评
1940年—1995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324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8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 (美) 伯科维奇 (Bercovitch, S.) 主编;

杨仁敬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80211-423-4

I. 剑…

II. ①伯…②杨…

III. ①文学史—美国 ②诗歌史—美国 ③文学批评史—美国

IV. I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315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特约编辑: 尹艳霞 詹 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366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15 千字

印 张: 34.2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本卷主译：杨仁敬 詹树魁 蔡春露 甘文平

本卷翻译：陈世丹 张龙海 谷红丽 王焯焯

萨晓丽 胡永红 孙 坚 王海燕

林 莉 范小玫 萧 飏 江春兰

这多卷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是美国文学研究的新里程碑，广泛涉及美国文学所有分支中新兴的以及业已确立的各种走向，它包括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新近成果，可谓集三十年美国文学批评研究之大成，因此，它既代表了两代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和延续性，又体现了两代学术研究的差异和分歧。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文学的各种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给予广泛关注。美国文学资料的扩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过去被忽视的作品现在受到了关注，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而言，都在急剧增长。《剑桥美国文学史》多样化的学术批评涉及社会、文化、意识诸方面，和以前的文学研究相比，它的视野和范围更为宏阔，更加精彩纷呈，这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

本卷内容涉及 1940 年至今的文学论述，涵括两种不同的资料与论述形式：美学和基本原理问题。

罗伯特·冯·霍尔伯格通过细读和美学评价追述了二战以来美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将美国诗歌作品看成是文化方面的成就——与整个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的美学发展过程。从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入手，冯·霍尔伯格对从“垮掉的一代”和“黑山派”诗人到纽约和旧金山的解构主义语言学派诗人做了论述。伊万·卡顿和吉拉尔德·格拉夫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理性认识和争论的历程，描述了从新批评初期渊源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批评和少数群体批评的产生以及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展开这一日益壮大的文学批评的平行发展过程。与这两种论述相连的是这些共同的脉络：诗歌的学术研究、艺术与政治的联系以及我们所称的“文艺”的扩张。

本卷作者抛弃了对主要作家进行概括性论述的传统做法，决定撰写一部从内部展开的历史，一部间隙与关联的历史，即一部注重考虑艺术关联、权力与文学批评的历史。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



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 5 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丰富多彩，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主编寄语：

我要特别感谢艾坦·伯科维奇、苏珊·米兹卢奇、赛勒斯·帕特尔。还要感谢协助制作索引的玛丽·安妮·贝尔斯凯维、负责校对工作的克里斯廷·爱德华兹以及整理参考书目的凯特·菲利普斯。最后，感谢亨廷顿图书馆时代-明镜研究基金会为我完成此卷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时间和资源。

萨克文·伯科维奇

诗歌、政治和知识分子

本卷部分书稿是我由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和亚历山大·冯·亨博尔特基金的资助在环境优美的慕尼黑大学美国学院休学术假期间完成的，感谢伯恩特·奥斯滕多夫和汉斯·加布勒。我还要感谢当时暂时离开的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生们就近十年来美国当代诗歌的多次讨论，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将可以在课堂上集中交流了。一些朋友阅读了部分书稿，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修改。值此机会向杰西卡·伯斯坦、拉尔夫·约翰逊、基斯·图马、艾伦·戈尔德、马乔里·珀洛夫以及艾伦·夏皮罗等表示谢意。我还要感谢帮我整理参考数目的斯蒂法妮·霍金斯和帮我查找资料的戴维·格拉布斯。非常感谢邀我撰写这部文学史的萨基·伯科维奇以及他的慷慨、热情的合作。

罗伯特·冯·霍尔伯格

1940年以来的文学批评

我们共同处理所有的资料，而不是将资料分用于每个作者所撰写的章节。有时我们也将对话和争议写进了书中。由古根海姆基金以及奥斯丁研究院的得克萨斯大学基金在资助，伊万·卡顿利用学术年假的初期完成此项工作。



杰拉尔德·格拉夫在后期得到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科研基金的资助。我们感谢这些机构的支持。还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生珍妮特·E. 海斯、凯瑟琳·M. 凯恩以及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威廉·萨维奇这些熟悉工作的科研助手。在撰写和修改“经典，学术界和性别”这一中心章节时，女同事安·柴科维奇、简·马库斯、莉莲·鲁滨逊以及研究生玛丽·安妮·伯尔斯凯维、凯瑟琳·M. 凯恩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在长期合作中的指导和耐心。

伊万·卡顿
吉拉尔德·格拉夫

序 言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开端。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帮助介绍了英语写作的一个新分支。随后30年，在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的主持下编写了《美国文学史》，帮助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人的工作。他们重新界定了这个领域的范围。这些学者和批评家主要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受过专门训练的，他们代表着美国文学所有分支：新的和业已确立的范围广阔的方向，代表着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形成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过去30年来，美国人所写的文学批评已经从边缘扩展到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本领域的活力在全国性和全球性的美国文学中越来越大，在学术活动的范围里和有关问题的热烈争论中得到了反映。有意义的是：美国文本已经成为跨学科和学科内调查研究的热点。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通俗文化研究在其他领域里已经贯串了这个专业的所有角落，但它们唯一最大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学标准的种种争论，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些问题都是跨历史和跨文化的，但这些争论本身则常常变成美国的专著。

然而，我们要使自己处于这些争论之中。看来这是清楚的：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为知识的更新和崭新的研究提供了源泉，发现了大量被遗忘或被低估的作品。我们现在更清楚地知道有人所所谓的“美国文学”（复数），这个术语是以坚持不同传统的美国、不同的美学甚至不同的文学概念为基础的。

这些发展扩大了美国文学的资料和内涵。对于这一代学者和批评家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一批公认的固定的美国名著的历史，也不再是以一种对美国文学固定的公认的历史观为基础的。应该说，对于固定性和一致性的追求仍将会继续，但这种追求现在是在一种批判的非中心化的氛围里进行的，即在争论、分裂之中，在不同阐释流派的相互补充中进行的。

这种冲突的景观标志着学术权威结构的变动。因此，一切文学史的实践，从18世纪它的起点开始，就依赖于对文学主体的本质及特征的业已建立的共识。今天，这种共识的运用听起来更像妥协的呼吁，或者像怀旧情绪。美国



文学史的研究如今具有多重内涵，即作为一种多声部的、学术上多方面的、批判的和教师的行业。这个语境的权威是由知识既有差异又有联系的知识体系来体现的。我们可以称它为差异的权威。它部分地存在于异质性的能量中：各种意见不同的选区居民、物质的机构和各色各样的权威。差异的权威部分地存在于批评家联系的能力：即将他或她的方法的特殊性转变为一种挑战和参与，这样它实际上就获得了与别人相关的，有时是互补的，有时是冲突的阐释模式的实质和深度。

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从两个方面具有权威性：既是相互争论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它成了它所描述的一种特殊的正在进行中的市场文化的代表。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多元化的，即是多种美国文学的联合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对立的。我们的文学史还是在专业范围内进行的关于文化模式和价值的争论的一种表述。其中一些叙述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它们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他一些叙述则明显是相反的，有待它们将文学分析变成对自由主义多元论的一种批评。不过这些相反的叙述在本书所展现的一种复杂的关系中是值得称赞的。实际上，可以这样说，它反映了这部文学史最传统的一个方面。持相反意见的批评派所设想的崇高的道德态势——将文学作为抗拒和选择的想象的机会，是以我们从浪漫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关于艺术的定义为基础的。更早些时候，高雅的文学观认为伟大的作品中存在着理想的共同性。因此，如同在所宣称的艺术的自主领域里一样，它往往对社会准则和实践，特别是对那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准则和实践进行直接的攻击。它培植了一种广泛的伦理和美学上的反律法主义，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即歌颂文学对人生的批评。到了20世纪中叶，文学批评则表现为：一方面是新批评派对于工业社会的攻击；另一方面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这里，对抗的与非对抗的方法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对于民族化的难以解决的观点。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包括后民族的或后美国的观点。这些观点的修正，有的在本书各卷里是不言明的，也许作为即将出现的文学史的形象或影子罢了。但最后，这里的“美国”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或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尽管我们有好几位作者采用了跨越大西洋或泛美的框架，尽管他们中有几位讨论了其他语言写的作品，他们所主要关注的仍集中在这个国家用英文写的作品，诚如从民族的含义上大家所理解的至今仍然这么理解的“美国文学”。从我们方面来说，这种限制标志着一种精心的选择。无疑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时间、空间、训练和可用的资料的局限性。但还必须补充说我们的撰稿人最充分地利用了这



些有限的资料。他们利用了时间、空间和训练以及可用的新资料的优势，可以将民族性本身变成文学史的一个问题。恰恰因为他们集中在美国的英语文学上，对他们来说，“美国”一词既不是叙述的主题——一种假设的或不可避免的或自然的前提，也不是一种客观背景即民族史。完全相反，它是多种文学与历史问题的是非之地。它自己所表现的是一种中性的领域，对所有权威的方方面面都是友好的，经过考察，变成或经常变成一种轻松的争论范围。

“美国”在各卷中是个历史性的条目即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种群体的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组成和维持的民族的宣言，即一套通用的原则、一种社会联合的战略、一种对社会抗议的召唤、一种预言、一种梦想、一种美学理想、一种现代的比喻（“进步”、“机会”和“创新”）、一种包含的符号学（“熔炉”、“百纳被”、“国中之国”）和一种排斥的符号学，不仅排除了那旧世界，而且摒弃了美国国内许多大集团以及南美和北美所有其他国家。这么设想的一种民族性犹如一个修辞学上的战场。“美国”在这几卷中成了探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不断变动的、多层面的焦点。

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些是今天文学研究中两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将历史的理论化搞得更激烈和深入了。究竟是什么连接了这个领域里的特殊兴趣，结合了我们当前分歧中的各个派别，是历史上具有压倒一切的兴趣，如思想、比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又如我们所阅读文本的物质和我们用以解读它们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很难说得太多。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作品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有些语言的结构已被提到很高的强度（即使我们相信，它们永恒的魅力变成了一种不断的对抗的根源），很明显，经过反思我们发现，关于美学上的超越概念本身是受时间限制的。像其对独立的文本的种种要求，从现象学的信仰到科学的客观性，美学对于高雅艺术的要求是由历史定型的。我们通过历史意识的识别，抓住它们超越的特殊形式，如灵感的美学以及含混、颠覆和不确定的美学。

对偶然性的认同同样扩展到历史著作中。一些史书比另一些史书更真实。有些史书一度充满所谓“肯定性”和“全面性”的光彩，但所有史书都是受其历史时期所限定的叙述文。这些也是如此。这里，我们的打算将是将这种局限性变成开放结局的根源。以前问世的各种美国文学史都是整体化的或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提供了一种单一理想的权威式的叙事或一种多样性的简略评价，这种简略评价看起来像是概括，即使是简明简洁的概括也极大地妨碍了作者声音的发展。形成对照的是，这部美国文学史将通过大规模叙述的多声部展现出来。由于撰稿人人数有限，每人都有展示不同观点（前提、争论和分析）的空间，所以，他们各人的叙述采用论证的方法以理服人，而不是以



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不管有什么差别，各篇是相互联系的，通过主题、关注、焦虑和希望彼此相关，这对于这一代的美国人是很平常的。

本书作者的挑选，首先看其优秀的学术成就，其次看许多不同批评流派在他们的评论中所展示的意义。他们一起显示了过去30年来美国文学批评的成就。他们在这几卷中所撰写的文学史表明了几代人之间的鸿沟和联系。他们对现在归于美国文学标题下的大量资料提出了意见，他们表达了各种不同的兴奋和赞许，使这个领域得到显著的扩展。同时，他们反映了我们时代文学研究的不同的兴趣，也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60年代以来那构成我国大学、系科和大学生特色的人种论的多样性。

同样的特性贯串了这部文学史的组织原则。它结构的灵活性意味着它包含了美国文学史的多样化。有些主要作家不仅出现在某一卷里，因为他们属于不止一个时代。有些文本在某一卷中几次叙述和反复讨论，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文化经验的领域里都很重要。有时，某个运动的故事从不同的观点反复提到，因为这个故事要求多种视角：比如有关主流和边缘的问题或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同样涉及一个运动。这么交叉叙述并不是原先计划的，但它从一开始就受到鼓励。观点的不同往往导致文史资料完全而充分的利用。而且，它对细节（作家、文本、运动）的叙述也比以前发表的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更丰富、更精细。

这部文学史各卷都以各自的方法显示了各自的优点，本卷在资料和叙述形式两大不同体例的协调平衡上也许特别显著。首先是美学上的：二战以来美国诗歌的发展过程，罗伯特·霍尔伯格先生适当地采用细读和精细评价的方法来探讨；其次是体制上的：这期间专业的文学批评的发展，伊万·卡顿和吉拉尔德·格拉夫通过人文运动和争论来描述。它看来形成了一套大家熟悉的两者交叉：创作与批评、美学与认知、自由化作家与学院派作家。不仅如此，每种情况的叙述都是建立在两套术语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的。霍尔伯格对诗歌的叙述成了一种文化成就的故事、一种美学发展的过程，它最终直接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它的一个强有力的主题是诗歌的学术化。对于卡顿和格拉夫来说，那也是主要的主题。他们也谈到单一的文化成就、建立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从那一术语的广泛意义上讲）。的确，他们指出了1940年以来美国文学批评如何稳定地或混乱地扩大了“文学的”范围，以便包括文化行业的全部系列即从哲学到大众文化。在两种情况下，作者用内部叙述的方法来讲他们的故事：从内部加以叙述，展现其变化的种种过程，而不是对已经出名的主要人物加以概括性的描述。



他们对方法的选择，并不一定是他们所使用的资料的同时代性的作用。事实上，现在的历史自觉地趋向于永久性的价值：将一些名著与过去的过眼的景观分开，以强有力的总体看法使直接的评判平衡。这样的评价在本卷中也是含蓄的，这里有主要的人物、中心作品，但它们的重要性从历史的叙述中流露出来；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记资料分别作为文献列在附录中，它们在其他资料中提供了权威性的参考资料导读。但叙述的中心仍在文化时期和文化事件上，这样，读者的观点就可以同时展现和显示于语境中：诗歌的形成，十年又十年，有时一年复一年，如同诗人所经历过的一样，批评家在工作，从一场争论到另一场争论，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些问题，正像这个专业不断扩展和变化一样。

霍尔伯格先生由表及里的叙述是对作为话语的诗歌的信心的一种证明。他的前提是：一种文学文化的兴旺是靠许多诗人优秀的水准建立起来的：与其说是三位古典诗人，不如说是现代有影响的40位诗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揭示了当代美国诗歌作为一个整体，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有机体的“确实特殊的成就”，这个有机体是由不同的诗歌组成的。它们将继续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诗人的作品里。他的论述实际上涉及每个历史的集合点：报刊、网络和飞地；诗歌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从抽象的表现主义到查理·帕克和麦尔斯·戴维斯的爵士乐）；诗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市民和学术社会机构的活动（其结果是诗歌更成为这种文学生活的专业化事件）；政治事件（从地区经济到国际战争）对诗歌的影响以及各种文人社区和社会运动：40年代和50年代从公众的抗议到激进的主观性的变化最后激进成了自我怀疑）；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的觉醒而产生的对旧思想的焦虑；从“垮掉的一代”和“黑山派”诗人到纽约和旧金山的后结构主义诗人的先锋派面孔的改变。

这种多样化的文化史显然是通过诗歌的叙述和用诗歌自身的叙述来表达的。霍尔伯格先生撰写时仿佛吸取了而不是超越了新批评派的手法。他在结构上的分类（政治、先锋派、后卫派、形式主义、真情派等等）区别了美国活着的诗人。他对各派诗人的选择是以美学价值（而不是空谈理论）的考虑为指导的；而诗歌的引文很充分，足以让读者自己作出评价。其结果是传统与创新的巧妙结合：作为文化史的诗歌的分析和作为美学批评的文化史。

卡顿和格拉夫的论著可以用同样的术语来描述：用文学批评代替诗歌。它本身的连接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过去的诗人经常这样形成批评的过程。但是，那种联系是一种共生的形式：诗歌滋润了批评，批评家犹如手持圣火的人。像卡顿和格拉夫的著作的主体所提出的，区分我们各个时期的，是一种



新的社会现实的兴起，一种植根于“文学”概念上的弹性宽广的世俗的学术主义，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好像跨越了“优雅的缪斯”，而涵盖了人类关注的整个范畴：它曾被忽略地踩在脚下，“穷人的文学”、“随意的文学和下层人的文学”、“街上的哲学”、“家庭生活”的含义。

这种走向民主美学的变动产生了具有同样重大的文学专业的变动。从神学到文学的现象学的过渡，关键是浪漫主义诗人代替了神父。当前，在文学学术领域里的变化，被标榜为批评家代替了诗人。正像卡顿和格拉夫所说的，这是有些不同的：从写得好的诗，古老的“言语上的偶像”过渡到文化的“文本”的，言语的结构，其“深度”并不那么在于意义的等级，如同它存在于所达到的多层次的经验里，它所提出的普通问题的范围以及它将其引为焦点的日常生活的景观。试将惠特曼解读如下：神圣的文学走了，民主的诗人来了，由文学和文化的教授陪着来了。

或者也许有另一种方法：诗人陪着教授来了。因为事实是，这种过渡，像它以前的那种那样，矛盾一直是很深的。卡顿和格拉夫的叙述有个优点：它们说明了这些矛盾，而不是回避或缩小矛盾。另一个优点是他们善意地从各个方面提出问题。结果，他们修正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相互熟悉的二者交叉，使得二者之间能够达到多方面的交流。这是很恰当的，因为文学专业的变化第一次应该这么全面的标明，并跟当代诗歌的活动同样全面地加以叙述。

从早一点的变化来看，这也是恰当的。卡顿和格拉夫所讲的故事——在教育学和学术上所记录下来的戏剧性变化，应该经常采用持续不断的形式。他们用争论揭开了我们当前的“文化战争”，并进一步指出它概括而不是威胁着文学研究的现代准则。亦即，他们用将现在语境化的方法尽力了解我们的过去。但从一开始，这种批评的学术化成了焦虑的根源。贯串学术化全过程的是，有些流派的批评家斥责其他流派的“专门术语”。始终如一地，这种指责被引向侵犯粗俗语、未消失语或未完全消失语以及仅仅是通俗语言——具有威胁性的小文化，那渗入隔着围墙的文化圣殿的“文化的”语言。而且始终如一地，在卡顿和格拉夫的叙述中，这种“高雅”和“低俗”之间古老的斗争展开了植根于民主美学的新挑战：训练上的交换对训练上的自主、流动性对固定的分类、协商对分开的范围、层次对意义的水准等。

按照年代顺序，本卷的评述从20世纪40年代学术批评的论争写到90年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有关辩论。卡顿和格拉夫沿着这个思路回顾了新批评提出的文本意义的问题、50和60年代理论的涌现以及70和8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发展，文学学术理论涌入了女性、少数民族和社会活动等文学的学术领域。作者所描述的情节结构，无论如何是概念性



的、共时性的、自我反思的、针对某个问题的。有一部分包括这部文学史与它以前的其他文学史的比较。本章的标题标明了我们时代的批评地图的主要地点：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在卡顿和格拉夫的评述里，这些令人生畏的结构（与反对它的负面反应）为累积的系列话语提供了背景因此，同样的问题得到重新界定，犹如它在各种批评的语言里一样。

对这些话语，有一种强烈的综合的推动力，将批评的运动与批评的时代联系起来，使每种话语模式从属于另一种话语中所表述的批评。这往往用一种特别强烈的有力的强调来加以补充。由于卡顿和格拉夫自觉地参加这些辩论，他们在分析中自觉地做到公正和平衡。他们同时是参加者、倡导者和解释者，阐明了解构主义的复杂性，评价了相对论的应用，并在学术实践中探讨了艺术、权力和批评（保守的和激进的）理论，而且往往是在学术实践中极端的关联所产生的语境。

综上所述，这两种叙述模式提供了表达主题的不平常的双极观点。它们展示了文学的双重含意，即作为诗的语言和作为文学研究的两个方面。它们传达了“美国人”的理想和学术的含意，如同这么表述：（1）文学批评史限定在美国文学史形成的语境中；（2）正在形成中的美国文学史是被放在批评史的背景里（互为补充或相互平衡），它构建了我们所指的美国文学。最后，这些历史是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的例证。不管任何时期，历史的写作，往往是我们所讲的故事与我们追求的真理之间的一种反思，对我们来说也是看起来像什么与对它们像什么之间的一种思考。卡顿、格拉夫和霍尔伯格由表及里的叙述是探讨怎样使写作过程变成现代史的范例。他们每个部分的叙述以各自的方法证明将美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学习的优点，不是作为编年史或文学精品或文学发展过程的终结，而是作为正在形成中的课题来研究，对文学史的再形成、修改和创新采取开放的态度。

玛格丽特·里德
萨克文·伯科维奇